

學術對談

本土傳播研究的下一步

對談人：汪琪、蕭小穗

統稿：蕭小穗



汪琪教授
(Prof. Georgette Wang)

「我認為在研究中指出理論與現實的矛盾之處、並彰顯文化特色與本土經驗是必要的，但這不是本土學術發展的目的與終點、而是基礎與起點。例如有學者指出「議題設定」理論在大陸並不適用，因為大陸媒體本來就是以設定議題為目的。確實，當媒體性質與目標都不同的時候，所謂「議題設定」的功能究竟是不證自明、完全失效、抑或會促使讀者從「官方/媒體議題」另外發展出一套「民間/讀者議題」？如果是後兩種情況，這對於「議題設定」理論的意涵又是甚麼？這些問題都可能導引出一套新的理論論述。」

汪琪，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終身榮譽講座教授。研究興趣：文化與傳播、社會科學本土化。電郵：telgw@nccu.edu.tw

Dialogue

The Next Step of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iscussants: Georgette WANG, Xiaosui XIAO

Editor: Xiaosui XIAO

Abstract

A large part of Georgette Wang's works has been devoted to highlighting a local perspective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xploring how this perspective can lead to a fruitful dialogue with the mainstream West. In this interview she calls for a “reconnaissance” of the “self” and the “other” for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In preparation for building locally grounded theoretical discourses, she suggests that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local experiences, but is also important for researchers to face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methodological paradigm in dealing with cultural issues in academic research.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Wang, G. (2014) The next step of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9, 1–15.

Georgette WANG (Emeritus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ommunication & cultur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

汪琪教授簡介

汪琪是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終身榮譽講座教授。她取得博士學位後，曾在美國東西文化中心傳播研究所擔任研究員，1982年回到台灣，先後擔任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系主任，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教授、所長、社會科學院院長，與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講座教授。2002年赴香港擔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講座教授、院長，2006年回到政治大學任傳播學院講座教授、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黃金輝傳播與訊息學院黃金輝講座教授(客座)。2010年退休。

汪琪的研究興趣主要在文化與傳播，近年則聚焦於社會科學本土化議題，並以此為主題發表多種中英文著作，包括2011年編輯出版的英文專書《傳播研究去西方化》(Routledge出版)以及《亞洲傳播學刊》專刊等。她曾經多次獲得學術殊榮，包括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亞洲媒體訊息與傳播中心(AMIC)「亞洲傳播獎」(Asian Communication Award)，與「星雲新聞傳播教育貢獻獎」。

GW: 汪琪

XS: 蕭小穗

XS: 您近年連續發表了幾篇有關本土化的著作，是甚麼力量推動您從事本土化研究？您的家庭背景和求學經歷與您的問題意識有何關聯？

GW: 我的父親雖然不是職業外交官，但父母親都是外交官子女；父親的工作也經常脫離不了「對外關係」。我在巴黎出生未久大陸風雲變色，全家去了香港，三歲轉赴台灣的時候，我只會說廣東話。十四歲時父親被派駐到東非的一個島國——馬達加斯加，我也跟着去住了兩年多，在一間法國修女辦的天主教學校讀書。回想起來，我對於文化議題的興趣、甚至學習的態度和方法多少受到生長背景的影響。但是會對「本土化」議題產生興趣，應該是生長背景加上研究經驗相互影響的結果。

和許多注意「本土化」問題的人一樣，我也是因為發現理論不適用，而醒覺到學術論述本身也有異文化的問題。最初我的反應是：要讓國際學界了解這當中的根本歧異。所以我早年的幾本著作，都是在凸顯媒體的文化特色、「在地」觀點或經驗。但是經過長期與華人及國際學者的交流，漸漸我感覺只是凸顯本土經驗是不夠的，因為本土學術發展最終無法迴避理論層級的討論與對話，而這方面所牽涉的就不只是「讓人家知道」而已，還包括學術典範、思考習慣、主體性、和學術政策等種種錯綜複雜的因素。最令人焦慮的，是不但「本土化」概念摻雜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說法，學界對於本土學術發展也呈現兩極化傾向：或是追隨主流、或是專注本土。每隔一段時間，「本土化」就被拿出來討論一回，但大家都是這個議題的過客，討論不容易深入。

XS: 您覺得傳播研究本土化最大的障礙是甚麼？

GW: 首先，我覺得「本土化」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本土化」要「化」的是甚麼？如果是外來理論，則「本土化」不過是「使外來的理論更適合本土」，但這種想法其實並沒有「主動出擊」的意思；就像是我們借別人的衣服來穿，本來不合身的，現在只是把它改得合身一點，但我們還是不會自己做衣服。因此如果我們最終的目標是提出主張、加入學術論辯的行列、「秀」出我們的實力，那就不只是讓外來理論更適合本土需求，而是發展自己的學術論述，所以我認為用「發展本土學術」比「本土化」的說法更貼切。

那麼「發展本土學術」的最大障礙又是甚麼呢？有人問我「是否接受西方」，彷彿本土學術發展的最大障礙是西方；將它除掉就可以了。如果問題的答案只有「是」或「不是」兩個選擇，則我必須答「是」，因為經過現代化洗禮之後，全世界只剩下一種被認可的知識體系，就是西方的知識體系；我們的選擇很少。但其實學術議題並不如此單純；我們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是」或「否」來給答案。這裏的「是」，指的是接受學術的「遊戲規則」，但這絕不等於「照單全收」。就好像在電影「少林足球」裏，周星馳參加足球比賽，雖然使出功夫怪招，卻不能完全推翻足球賽的規則——即使這確實是他最終的目的。

回到阻礙本土學術發展的複雜因素，我在即將出版的一本書中有比較詳細的討論，¹這裏因為篇幅有限，我就從最基本的障礙開始談起，也就是本土化的終極目標——目標不清楚，任何事情都很難有進展。

現在文獻中有關「本土化」的討論，大多以發展「亞洲/華人/中國傳播理論」為目的；但我認為這目的是有矛盾存在的。基本上，無論亞洲或華人傳播理論都是對於「歐洲中心主義」的一種反制。換言之，「本土理論」是相對於「外來理論」的；當我們意識到外來理論並不能貼切解釋、或分析本土現象的時候，第一個反應是：我們要有「自己的」理論、適用於我們的社會文化、反映我們的需求與價值觀。有了屬於自己的理論，才能平衡目前學術論述向歐美傾斜的問題、才能補足學術地圖中失落的部分。

這些主張言之成理；但是深入一點去想，從方法論或文化本質上看都會遇到問題；由文化本質來說，把理論分成「我們的」和「他們的」，是要凸顯「我們」與「他們」的不同。但是理論畢竟和地圖不同；發展理論也不是劃地盤。這種劃分方法其實忽略了「我們」和「他們」之間並非沒有相似之處；而被劃入「我們」或「他們」範圍之內的文化，也不一定就是同質的。前面提到「自己的」理論要反映「自己的」社會需求與文化價值；但「自己」是誰？亞洲人？華人？中國人？還是北京人？在台灣，有許多學者主張「本土化」不是「中國化」；而許多大陸學者也強調「本土化」不是「香港化」或「台灣化」。因此如果將台灣、香港、新加坡、和中國大陸都納入「華人」的範圍之內、統一處理，與「歐洲中心主義」將所有人納入「人」的範圍統一處理，基本上只是程度的差別而已。另一方面，在歷經現代化洗禮之後，在例如「企業組織溝通型態」這些議題上，華人與西方的差距，未必比同為華人社會的差異更大。主張發展具有文化特色理論的學者未必不了解這其中的矛盾，但堅持「事有可為」；在我看，這卻是一個難以拋棄的包袱。

發展屬於某一文化的理論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本土化的作法，就是摒棄西方、把突出本土的「獨特性」作為研究目的。這些研究讓我們把眼光拉回到本土，開啟了視野的另一扇窗；但是

長遠下去，只看「別人所沒有的」價值或現象，就侷限了自己的發展空間、甚至有陷入「東方主義」陷阱的顧慮。再者，既然每個文化都是獨特的，則專屬於各文化的學術論述就應該各有各的評判標準與學術語彙，但如此又怎麼進行學術對話、論辯與交流？在社會科學的領域，心理學在「本土化」起步最早，現在他們面對的是五花八門的「民族心理學」、「本土心理學」與「人類心理學」等等，近年也開始有人提出「學門是否會崩解」的疑慮。非西方學界必需要指出「普世主義」所造成的「以偏概全」的問題，但正如勞思光教授所說，我們是要把自己放在「世界的對立面」、還是「世界的裏面」來談？

我認為在研究中指出理論與現實的矛盾之處、並彰顯文化特色與本土經驗是理所當然的、也是必要的，但這不是本土學術發展的目的與終點、而是基礎與起點。很可惜的，是許多年輕學者在遭遇到問題的時候，不是不顧一切「照搬」、就是完全排斥西方論述、甚至排斥理論，如此把一個很有發展潛力的議題草草結束了。例如有學者指出「議題設定」理論在大陸並不適用，因為大陸媒體本來就是以設定議題為目的的。確實，舉出中西媒體性質的差異是在中國大陸談「議題設定」理論時所必須做的；不過如果我們就此打住，可能錯過了這主題最有趣的部份，也就是：當媒體性質與目標都不同的時候，所謂「議題設定」的功能究竟是不證自明、完全失效、抑或會促使讀者從「官方/媒體議題」另外發展出一套「民間/讀者議題」？如果是後兩種情況，這對於「議題設定」理論的意涵又是甚麼？這些問題都可能導引出一套新的理論論述。

確定目標很重要；過去不少主張「本土化」的學者也認為要同時進行「全球化」，但很少人去談「怎樣可以實現這個願景」。缺少了具體可行的方案，目標就顯得「華而不實」。沒有具體可行方案的部份原因，是我們沒有去作深入的探索，但也有很大一部份是西方思考模式所造成的僵局。最近我就如何進行「下一步」提出了一個想法，就是以「可共量性」(commensurability)取代「普世性」。這麼做的目的不是要跳出來說「我知道怎麼走、我來告訴你」，而

是希望能夠讓「本土學術發展」的議題繼續發展下去，而不要一直停留在重複訴說願景的階段。

XS: 為何您認為發展本土論述需要以「可共量性/相通性」取代「普世性」?

GW: 「可共量性」與典範轉移的想法，可以說是被逼出來的。我在編輯「去西方化」的那本書的時候，書稿送審之後，評審回來的意見是：這麼多作者提出這麼多不同的看法，這本書要停留在各說各話的狀態嗎？在出版商要求有「結論」的情況下，我必須尋找一條「異」中可以求「同」的途徑。

前面我們談到，許多人在談本土化議題的時候，常把「中」和「西」、「社會現實」與「理論」、「西方」與「去西方」對立起來，其實這種想法反映的正是西方「二元對立」(dualism)的思考模式。千餘年來，歐洲不斷有思想家嘗試打破這種模式的限制，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在各門各派的學術論述中看到它的化身；化身之一，便是方法論上有關「普世性」與「特殊性」的二元對立。用最簡單的話來說，這一組二元對立的意思，就是「不是一樣的，就是不一樣的」，沒有模稜兩可的空間。換言之，我們在談「普世性」的時候，「特殊性」並沒有一個合理存在的空間，而當我們在談「特殊性」的時候，也沒有「普世性」合理存在的空間。在這樣的思考模式下，本土學術又怎麼可能同時兼顧本土的「特殊」與理論論辯所需要的「普世」?

上世紀後期，我們見證了「普世主義」與「科學主義」的全盛時期，這段時期出現的許多理論，包括傳播研究的媒介效果理論、涵化理論與議題設定理論，重點都在「普世性」、都被看成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我們也都「拿來」用過。近年來「普世主義」的缺失開始浮現，於是研究重點由「普世性」擺盪到「特殊性」；「後現代理論」、與「詮釋學」逐漸成為顯學。表面上看，西方學術的觀察重點有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轉，關鍵是這翻轉的軌跡卻沒有脫離二元對立的模式：在這種「非此即彼」的框架下，即使教科書裏已經對「普世性」採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甚至主張「科學很難用單一的規則或活動來描述」，但還是得強調科學是一種取得「可靠」、和

「有效」知識的途徑。²而藏在「有效性」與「可靠性」背後的，仍然是「普世性」的近親：「一般性」(generality)。主流學界或許是承認了文化社會與理論生產的關係，但實際上「後實證論」的主張並沒有面對、也沒有根本動搖「特殊性」與「普世性」的對立關係。因此Goonasekera與郭振羽在談到亞洲傳播理論的時候，³就曾經說過：「『亞洲』是特殊的，但理論是普世的。這就是矛盾之所在，也亞洲傳播理論所必須面對與解決的問題。」同樣的，華人學者所談的「中西融合」或「去蕪存菁」，如果要放在西方的學術脈絡來看，都同樣可能走入二元典範所形成的死胡同裏去。

「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ility)的概念，是孔恩(Thomas Kuhn)在討論典範與典範間的差異時所提出來的。他認為經過科學革命而崛起的典範，與舊典範之間必然存在「不可妥協」的差異，因此兩者是不可比較、所使用的語彙也是無法翻譯或互相轉換的；換言之，是「不可共量」的。但是在各方質疑之下，他在晚年不得不將概念作了更細緻的修訂：不可「翻譯」的語文未必不能經由「詮釋」達到溝通的目的。「翻譯」是有系統地以一個語文中的文字，以另一個語文中意思「對等」、或「差不多」的文字來代替。⁴「不可共量」的文本雖然不可翻譯，但仍然可以使用「詮釋」的方法處理；只是「詮釋」需要更多的準備功夫，包括弄清楚它的預設，甚至文本當初完成的時空環境背景等等。

XS: 相較於傳統分析框架，這個概念有何增值？

GW: 用在學術論述的異文化問題，「可共量」概念有一個「普世性」所沒有的關鍵性優點，就是它所要求的是「相似」或「對等」、而非絕對的「相同」；也就是「一樣中仍可存有不一樣」；因為只是「雷同」，「特殊性」就保有了一個合理的存在空間。相對的，即使「不可共量」，也仍然可以找出一個相互溝通與交流的方法，只是要繞得遠一點去尋找雙方可以互通的語彙與經驗來達成任務。回到人類社會來看，無論我們以甚麼標準來劃分族群與文化，應當都可以同時找到這些族群文化與其他族群文化一樣和不一樣的地方：我們生存的時空軸線既然不可能與別人完全一致，彼此間就必然產生差異；但如果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人也就不會有溝通與合作的可

能。由這個角度分析，「共量/不可共量」比較「普世/特殊」的二元對立更貼切地掌握了人類文化相似與相異的特質。

「可共量/不可共量」概念無意中打破了「普世/特殊」互不相屬 (mutually exclusive)、各處極端的僵局。只是孔恩的重點在描述新舊典範差異的性質，因此並沒有去關照「可共量」與「不可共量」之間的相互關係。但文化與典範不同、是「活」的、開放的、有動力的、不斷變動的。因此由異文化的角度來看，「可共量」與「不可共量」不但相依相隨、在性質上兩者的相互關係也必然「多元」；正如「陰/陽」典範，它們是互補互沖、相互激盪，但又是相互融和與相互彰顯的。

「不可共量性」讓我們免於武斷、輕率的推論、引領我們經由詮釋的功夫，找到本土經驗與外來理論「可共量」的部份；而「可共量性」讓我們找到理論對話與交流的基礎，兩者的對比，更蘊含無數理論創新的線索。換言之，無論作研究的人選擇把重點放在外來理論與本土現象的可共量性或不可共量性，他都已經不僅僅是要指出本土的特殊或普同之處 (也就是“what”的問題)，而是描述本土經驗「如何」展現獨特性、它與 (外來) 理論論述間「如何」相通 (也就是“how”的問題)，以及這兩者相互觀照所透露的意涵。如此，作到「立足本土」的同時，才可能也作到「放眼天下」；而我們眼前的所謂「天下」，也才不至於淪為「西方的自白」。

XS: 您覺得要發展與主流學界的對話，我們需要做些甚麼？

GW: 理論上我們要作到「立足本土」並不難；無論質化或量化研究，基本上西方的學術論述都是由解析現有文獻的缺失，進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在收集資料之前的「文獻探討」就非常關鍵；作者必須兼顧空間的橫向軸線與時間的縱向軸線。橫向軸線包括「外來」與本土文獻，而縱向軸線則包括理論與概念的歷史文化脈絡、以及一項理論論述從提出以來的討論。過去本土研究之所以經常陷於「套用」西方框架的泥沼而不自拔，一方面是因為作者不重視它與本土脈絡之間的歧異與共通之處，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經常忽略了這框架的利弊得失，而利弊得失的討論，直接牽引着作者所要提出的主張。

表面上看，上述的這些步驟並沒有超越一般研究的標準程序，但是說起來容易，這些程序都是依據西方的思辯(dialectics)傳統所設計的，如果要在這框架下切實作到「立足本土」，除了前述方法上的功夫，至少需要作到以下三點：建立主體性、摒除對西方的依賴、並且由歷史文化重新認識「本土」。前面兩項是研究態度問題，後面則是知識素養問題。這些主張都不新穎，但一次演講過後，一位學員問我：「妳的主體性是怎麼來的？究竟要怎麼做才会有主體性？」不但如此，許多年輕人甚至說「(理性)批判讓他不自在」。沒有主體性、迴避批判，又如何奢談「獨立思考」？這些問題讓我醒悟到，其實很多年輕人不是不了解甚麼東西重要，而是不清楚為甚麼重要，尤其是「該怎麼去做」。

以「主體性」為例，它會變成學生眼中一個飄渺難以捉摸的概念，和華人傳統對於「讀書」的態度有點關係。春秋戰國之後，科舉成為朝廷選拔治理人才的途徑，從此讀書人「治學」的目的變成是要透過聖賢之學來提升自我；也就是說，讀書就是要把書中的內容完全吸納、「內化」，如此自己才能「修」成「才情品德兼備之士」，進而談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讀書人的「我」是一個有待轉化的「客體」，而不是一個具有自己看法的「主體」。簡單的說，在漢以後，中國士人就在「學而優則仕」的前提下把「主體性」擱置了，而且一擱就擱了兩千年。清末西學東漸，到了五四運動時期，「聖賢之學」已經被徹底排除在科學知識的門外，古聖先賢也被知識分子由神主牌位上拉下馬。從那時起，中國讀書人對自己的文化思想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興趣；但這學習模式卻在無意間留傳了下來。今天許多年輕人讀書講究把理論「讀懂」、「讀通」，甚至在各種社會運動中努力實踐。他們可以把一位華人或西方「大師」的思想倒背如流，但對於這思想所引發的種種討論議題卻可能不甚關心；他們提不出、也不認為自己需要、或有資格提出自己的看法。由這些現象來看，「治學」傳統在本土學術的比重，遠比「思辯」傳統來得大。

事情之所以至此，與我們的教育體制不無關係。如今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模式都承襲自西方；除非經過一番努力，否則我輩學

界中人對於本土文化與思想論述的認識，幾乎停留在中學階段。相對的，對於西方思想的了解，我們又缺乏基礎訓練，結果是兩者都有欠缺。先天已經不足，學術政策卻又一切以「國際競爭力」為前提，更進一步限制了本土學術的發展。

在教育體制與學術政策有根本改變之前，要切實作到「立足本土」，確實只能在範圍內「盡力而為」而已，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甚麼也不必做；我深信無論多遠的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都可以走到目的地。相反的，如果我們一直停留在原點，也就永遠不可能有任何進展。

XS: 當代傳播研究應如何在這方面展開？

GW: 在別的社會科學領域，近年來開始有亞裔學者撰寫由本土觀點出發的教科書。目前傳播學門有不少中文教科書，但是好像還沒有一本可以充分代表「華人觀點」；長遠看，如果本土學術真要「走自己的路」，這是十分需要的。由於這樣的教科書不只需要數據、更需要有足夠的本土論述作支撐，因此我們仍然需要回頭來看「如何促進傳播研究的理論論述」。

一九七零年代，包括余也魯、徐佳士與孫旭培等港台大陸學者曾經呼籲傳播研究「本土化」或「中國化」。這些初期努力的成果，大多是古籍中所顯現的獨特傳播型態與現象；這研究路線一直延續到今天。除此之外，傳播研究領域「本土化」呼聲較為響亮、功夫下得較多的，是文化歧異最容易被凸顯出來的跨文化傳播研究。相對的，媒體研究所面對的，是所有社會共有的傳播媒體，因此社會文化的「不可共量」往往較為隱晦。

過去的努力或許沒有一舉解決所有問題，但是今天談本土傳播研究的未來，不是要否定過去，而是要站在「巨人的肩上」、超越過去。超越的方式無數；現在我所提議的，是結合典範轉移和「可共量/不可共量」概念的途徑，從「異中求同」也從「同中求異」，也就是發掘本土與西方在傳播議題上的可共量與不可共量之處，並在這根基上發展論述。近年來我們在跨文化領域讀到許多影響中華、或亞洲人際傳播的獨特文化價值與因素，包括和諧、關係、面子、緣分等等。這些價值與概念誠然有華人專有的面向，

但多費一些功夫，卻未嘗不可能找到理論化、以及和國際學界對話的途徑。以「關係」為例，華人與其他族群所不同的，不是有關係或沒有關係、而是「關係」在定義方式、重要性、功能、以及影響等面向的差別。主流文獻——尤其心理學的相關研究——就是我們進一步發展理論對話最重要的參考。另一方面，即使看似全然獨特的文化價值，例如「和諧」，如今也因時代變遷而有了不同的意涵——事實上在歷經現代化與民主化之後，任何固有文化價值都不可能繼續維持千餘年前的意義與重要性。要追本溯源，我們必須回顧歷史過程，但我們的研究重心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古代。

至於媒體研究，多年來理論層面的論述不但較少見到「本土」的身影，而且論述本身始終沒有突破「效果」的大框架。最近Annie Lang的一篇文章，⁵直指領域間一股不安的氣氛：媒體效果研究作了數十年仍然沒有突破、大家也仍然繼續做。確實，以媒體近年來的巨大變化，媒體理論的發展是相對貧乏的。這裏也可以看到「媒體」與「閱聽眾」被放入一組二元對立框架之後的限制：縱使網路媒體已經使「傳播者」與「接收者」的身份交融在一起，Lang在討論典範危機的時候，也仍然只突出「信息」與「接收者」互動過程的發展潛力，而避談「信息」背後的「人」。

事實上被放入二元典範並不只是「媒體」與「閱聽眾」、還包括「文化」與「資本主義經濟」、「全球」與「地方」等概念；相關議題的討論也都受到限制。多年前我就曾經提出傳播研究需要進行「典範轉移」、開啟新局。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傳播者」與「接收者」之間只有單方向的影響值得談嗎？如果不是，這兩者的互動還有甚麼值得我們觀察與省思？新媒體普及之後，這脈絡中傳播的意義、型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有甚麼改變——例如網路傳播與集體行動之間的密切關連，在理論的意涵是甚麼？媒體理論還能繼續停留在媒體本身的討論嗎？這些都不過是新論述一些可能的切入點；而這種思考的依據卻不是二元對立、而是陰陽典範。

事實上，在主流典範發生危機的時候，「不可共量」在媒體研究尤其重要。前面我們提到「議題設定」理論在中國大陸不適用，

其實正是開啟論辯與新局的契機。同樣的，台灣和印度學者無法在自己的社會找到「公共論域」的證據、與亞非國家近年報紙與手機同步成長的媒體發展型態，都是建構新論述的契機。

XS: 您對青年學者有何建議？

GW: 我遇見過許多非常關心本土學術議題的青年學者；他們對於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感到迷惘、焦慮，很在意自己的研究「夠不夠本土」，但是他們不清楚怎麼去問問題、也不認為自己有資格對別人研究的好壞去「指指點點」。青年學者是未來之所繫；他們是否關心這方面發展，關乎本土學術的前途。但是在大環境種種不利的因素之下要致力「立足本土」並非易事。首先方向要掌握好，其次基本功絕不可馬虎；更不可操之過急。

「方向」前面已經談得很多；那麼「基本功」是甚麼？我認為至少要包括兩方面的準備：首先是對於學術上的「他者」，也就是歐洲思辯傳統的掌握；其次，是對於學術上的「自我」，也就是本土經驗與思想的掌握。思辯傳統重要，是因為我們在西方的學術脈絡之下去從事研究，不只要遵守、也要了解它的遊戲規則是怎麼來的。思辯傳統自希臘以降，便主導西方推展學術論述的精神與方法。但問題是在歐美國家，這種思維方式的訓練在基礎與中等教育的階段已經養成，不會到了大學和研究所階段又由頭教起。不幸的是，我們留學歐美，大多數是由研究所、或者大學開始讀起，因此只學到了研究方法的步驟、卻錯過了思辯思考的基礎訓練。

在思辯傳統之下，「主體性」、「理性論辯」與「獨立思考」是彼此牽連、缺一不可的。相對於「治學」模式中的「我」是有待提升的「客體」；「我」是「思辯」的「主體」，會由自身的觀看角度來了解他所讀的內容、並且研判論述的周延性與有效性。這裏的重點不在「我」是否「博覽詩書」、將每字每句讀得通透，而是他有沒有抓住論述的要點，形成自己的看法、並且清楚解釋這看法的依據是甚麼。換言之，在思辯傳統之下，讀書人與他所讀的書之間是「兩回事」；但是在治學傳統之下，讀書人卻是要內化他所讀的書，因而和所讀的書是「一回事」，因此不需要有甚麼「看法」。這個差別

在問問題的能力上就非常清楚的看出來。今天高校研究所「研究方法」的課程都會強調研究問題的重要性。在西方的思辯傳統，「問題」是科學發現與知識建構的起點。但是對中國讀書人而言，「聖賢之學」是無庸置疑的；在兩千年的「內化」壓力之後，讀書人不但無法習慣西式的發問與質疑，連春秋戰國時期諸子「體悟」與「轉化」的功夫也早已失落。青年學者的第一個功夫，因此不只是知道「主體性」等概念的重要性，而是要了解這些概念如何體現在他們的研究裏面。

「立足本土」的第二個條件，是對本土經驗與思想的掌握。前面我們談到，十八世紀以降，科學成為「知識」的判準；所有「不科學」的文獻都被認為是沒有價值的；影響所及，不但「國學」被限縮到中國文史的領域，一種「輕本土、重外來」的傾向，並且逐漸延展到近代累積的本土文獻。然而今天如果我們要在研究中彰顯「本土」，就必須要問：我們對於這學術上的「自我」究竟了解多少？文化價值與傳統思想重要，不僅僅是因為它是「本土」的根源，更因為它可以提供我們不同於西方的思考角度、這是西方所沒有的珍貴資源。舉例來說，道家的陰陽觀確實混雜了迷信的成分，然而這無損於它在分析社會現象的潛力。但是要有效利用這些學術資源，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學養與靈敏度去發掘它的價值、與足夠的能力以現代學術語言去詮釋因時空所造成的「不可共量」。前面我們談到「少林足球」的例子，周星馳的成功在於他把少林功夫融入了足球技巧，讓大家可以欣賞而他可以贏球；但如果他只是在比賽場上自顧自地練氣耍拳，即便裁判不把他趕出去，觀眾也看不出玄妙之處、對他或對球賽都沒有意義。

「立足本土、放眼天下」是長遠目標，我們不可能期待每一篇論文都能夠帶來劃時代的突破；但是「千里之程起自足下」：準備工作必須立即開始。無論在學術的「他者」或「自我」的面前，我們都需要更謙卑地面對自己的不足、但更大膽地接受挑戰；有了第一步，才有未來的無數步。

XS: 我們非常感謝您與讀者分享您的觀察和洞見。

汪琪著作選

- Wang, G. (2011) Paradigm shift and the centrality of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Feature, 1458–1466.
- Wang, G. (Ed.) (2011) *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hanging Questions and Altering Frameworks*. London: Routledge.
- Wang, G., & Chen, Y. (2010) Collectivism, relations, and Chinese communic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1–9.
- Wang, G. and Kuo, Eddie C.Y. (2010) The Asian communication debate: culture-specificity, culture-generality, and beyond.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 152–165.
- 汪琪 (2011)。〈全球化下的在地觀眾〉。《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8期，頁17–44。
- 汪琪、沈清松、羅文輝 (2002)。〈華人傳播理論：從頭打造或逐步融合？〉。《新聞學研究》，第70期，頁1–15。

本文引用格式

- 汪琪 (2014)。〈本土傳播研究的下一步〉。《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9期，頁1–15。

註釋

- 1 即將出版，《邁向第二代本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 2 Christensen, L. B., Johnson, R. B., & Turner, L. A. (2011). *Research methods, design, and analysis* (p.12). Boston, Mass.: Allyn& Bacon/Pearson.
- 3 Goonasekera, A., & Kuo, E. C. Y. (2000). Forword.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2), 7–12.
- 4 Kuhn, T. S., Conant, J. & Haugeland, J. (Eds.). (2000)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hilosophical essays, 1970–1993*, with an 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 (p.36).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 Lang, A. (2013). Discipline in crisis? 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10–24.